

「譏上變古易常」——這是如何可能？

劉紀蕙*



自 1984 年返國教書以來，我開始針對臺灣文化狀況與心態結構進行長時間的思索與研究。我的問題意識環繞著二十世紀臺灣海峽兩岸複雜的政治無意識，全球冷戰結構的本土擴散與轉移，新興民族主義的出現與變形，文化認同與主體心態的逐漸重組，以及知識型態的轉型。我先後完成了心態史拓撲學四部曲：《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2000)，《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2004)，《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2011)，《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2020)。

臺灣自 1980 年代以迄 1990 年代，自戒嚴時期進入解嚴時期，文化認同的轉變與掙扎在不同的角落發生，影響了每一位走過這段歷史的人。對於許多人而言，這個問題迄今尚未解決。我當時同時思考了文學史與文學論壇的正統化趨勢。《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中，我以「我們的症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

狀」來檢視八、九〇年代不同的舞臺作品如何展演出這個時代文化認同轉向的掙扎與摸索。同時，藉由歷史回溯的方式，從日據時期、戒嚴時期到解嚴時期，我探討各種溢出正統的超現實書寫所鑲嵌的時代現實。我認為這些藝術家分別以各自的書寫，展現不同於主流意識形態的負面臺灣本土意識。

面對激動的民族主義情感，我開始反思二十世紀上半期現代國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心態結構及其形成過程，並回溯十九世紀中後期到二十世紀初東亞現代性知識範式轉型的複雜脈絡，以及這個轉型如何在文學、藝術、電影、政策、教育等文化面向展現。第二個階段的研究中，我先後完成了《心的變異》及《心之拓樸》兩本書。

《心之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這本書思考從二十世紀上半期臺灣與中國為何發生了共同朝向集體的想像，以及這些想像如何展開各種論述與知識架構，從而構成了我所謂的「現代性的精神形式」。我看到在各種論述中，個人生命力被轉移到民族生命力的位置，並且以一種身體想像統合此形式：從 1920 年代中國的前衛精神，1930 年代「群」的渴望與烏托邦的想像，到 1940 年代集體戰鬥的情懷，甚至臺灣皇民主體「心的改造」。撰寫過程中，我同時意識到，若要檢討二十世紀現代國家集體想像以及各種國家體制的出現，必須倒退回到十九世紀中後期從日本到晚清的倫理論述，以及 1895 事件後十分突出的「倫理」重構。我認為這個倫理論述的轉向，具體而微地說明了晚清知識範式的整體轉型。在《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中，我分析在這個倫理重構的話語叢結中，(國民)「主體」的基礎如何被描繪與建立，也提出了「心的治理」(psyche-politics)及「倫理—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來解釋(國民)主體的倫理生活如何被計算為國家可以使用的資本。當時的知識分子依照這些倫理邏輯來定義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並依此論述模式執行教育體制的實踐，以及大眾化知識的傳播與擴散。這個知識生產的複製，也讓(國民)主體的倫理位置深深扎根。

探討倫理重構與知識轉型的現代性精神形式過程中，讓我疑惑鑲嵌於時代脈絡中的知識分子，如何能夠如同譚嗣同與章太炎一般，挑戰同時代共名體系與倫理意識形態？章太炎所提出的「譏上變古易常」是如何可能的？我帶著這些問題，開始了第三階段《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的研究。

這本書的研究進行了十年，全書分為四部分：

我在第一部分梳理了從黑格爾、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關於「一分為二」的論述轉型，並以楊獻珍「一分為二」的哲學事件，說明冷戰時期複雜的對抗性結構，以及思想革命轉化為思想鬥爭的絕對化過程。我指出毛澤東 1957 年提出「一分為二」的辯證法論點，以及 1958 年的臺海危機與絞索政策，牽涉了冷戰局

勢中的中蘇關係變化、中東權力翻轉、反右傾、大躍進、全國公社化等因素。從毛澤東 1937 年《矛盾論》到 1958 年的一系列文章，反映出了時代性多重決定的複雜整體結構，如何改變了毛澤東的論述位置及後續的政治決策。

本書第二部分以 1970 年代「儒法鬥爭」事件作為思想分歧「一分為二」的典型範例，並以此事件作為哲學考掘學的標記與索引，討論中國思想史中「規範性治理範式」及「解放性批判政治」的動態關係。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一世紀幾次儒教復興背後的政治經濟因素，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儒教政治神學自我創造性轉化的悖論；我們也看到了歷代針對權力集中及土地集中，而提出各種變法改制的「解放性批判政治」實驗構想。

本書第三部分繞道西方，分析西方漢學家為何無法掌握法家與道家最為激進的批判政治力量。十分弔詭地，1960 年代深受毛澤東影響的歐陸思想家反而更可以協助我們從「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重新思考如何面對當代現實社會，進行唯物辯證分析。本書第四部分重返中國政治思想，以晚清章太炎的政治理念與「一分為二」，作為「解放性批判政治」的代表。我指出，章太炎強調萬物各有時分、與時差異、文之轉化代無定型，以及法不過三代，而提出春秋的「譏上變古易常」原理，具有嚴格意義上的唯物辯證與批判政治史觀，對當代的政治哲學仍舊有巨大的啟發。

我的研究跨足中外思想，涉及文學、藝術、歷史、政治、哲學、精神分析、批判理論等跨領域範疇。我的研究路徑時常在摸索中前進，並沒有預設的結論，而是隨著過程中大量閱讀的材料而開啟新的路徑，發展新的想法。但是，由於面對不同的歷史材料及政治結構，也靠近不同人的思想，這個過程時常讓我經歷到巨大的疑惑、痛苦、訝異、興奮，以及完成階段性思考工作之後的滿足感。

一般而言，具有探索性而不拘泥於單一學科的學術路徑，不容易被任何學門所接納。《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能夠迴響，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肯定；對於臺灣學術界而言，我認為也意味著對跨領域學術視野的拓展。

我認為學術研究與個人生命必須保持一致性。我會鼓勵年輕研究者不要自我設限，而要面對自己關切而沒有解決的問題，持續探索，朝向未知的領域尋找答案。

我目前仍舊在進行幾個大型研究計畫，核心的問題意識環繞著「公民政治」的悖論。我將會繼續針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與書寫。